

第三章 马凡小说的艺术技巧

马凡的微型小说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给人一种浑然天成之感。他的小说叙述层次清晰，交代周详，情节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如《抢手货》先写陋巷之陋，鲜少有人光顾，却出现了两个警探式的人物，令人疑惑莫解，使得小说顿生波澜。接着又来了几个人，与前来者发生武斗，后来者不敌而败退，更使人疑窦丛生。然后写前来者抬着一个布包袱放到车上，扬长而去，人们不知何物，又产生疑窦。最后写驼背夫妇发现残疾儿子失踪。这一系列情节，波澜起伏，脉络清楚，不枝不蔓，尤其是层层设置悬念，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在结构上作家借鉴了戏剧创作的“突转”的手法，在情节发展的关键部位戛然而止，引出相逆的结果。这不仅营造了波折性的惊奇，而且能画龙点睛地暗示出主旨，使读者豁然开朗。如《涅槃》，对万富自杀的原因，警方历经十年没有破案，而一个醉汉的一句“没有子嗣继承大业”的话，却一语中的。这里在醉与不醉的对应中，促使人思考许多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此外，马凡还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来突显其表达效果。如《求禅》中的景物描写，充满诗情画意，渲染了神秘的气氛，恰与“心明大师”的骗术形成鲜明的对照。《孪生双鸡头》运用荒诞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反映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大钞》以鬼钞为象征，暗示出积恶必亡的必然逻辑。《竞赛》则以对话形式，通过学者与司机的对话，道出了龟兔赛跑的新故事，既有风趣和新意，也显得作品简洁而生动。^[1]

人，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体，不管作家是想要表达理念或是想法，都是以人为主体而扩展的。小说的主体活动，就是展现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是文中的主人公。要突出文中主人公的位置，就必须掌握一定的技巧。小说写人，小说离不开人，没有人，小说就没有所谓的文学性质，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去致力表现好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以及主要人物。写小说，就和讲故事一样，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好一个故事的技巧。而要把一个故事讲好，把一个故

^[1] 赵朕. 憎爱鲜明走龙蛇——论马凡的微型小说创作[J]. 盐城师院学报, 1998. 3.

事讲得耐读有趣，这就是一种文学能力，既是天赋的，也是后天技术的训练，两者的奇妙结合，就会使自己诉说的故事出人意料，不可思议。写小说，是需要讲究一定的技巧的。

其一是取材要讲究，取材往往来至生活，所以任何一个有名气的小说家不可能不体验生活。他们有的甚至十分的贫困，来至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得到了生活的丰富题材积累。小说家一般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却照样能写出好的小说，比如高尔基，而他的取材就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其二是想象力要丰富，一般小说家的想象力都很丰富，文无定法，都是有感而发。纵观历代小说家，他们的创作无不是有感而发。也只有有了生活的感觉，有了生活的感受，才能够写得好的小说作品出来。他们一旦有了感觉，不写出来，就会憋得慌，就会不舒服。所以他们的创作，往往可以一气呵成。而他们的感情也往往都很脆弱，他们可以时而哭，时而笑。所以作家一般自杀的都比较多，比如老舍。

其三是文字优美，内容大气，跌荡起伏，给人艺术美的享受。小说本来就是文字表达的艺术，用文字来表达一个主人公的爱情、亲情、感情以及思想动态，来体现人性，人的本性。用一种温暖的笔调，来阐述一个人的命运。

其四是小说的结构要生动合理。小说的开头，一般要有震撼性，要制造悬念。小说的内容要生动，细节要感人。小说的结尾，一定要有意外，这样才能体现小说的艺术美和价值美。

其五要善于进行细节修改，通过不断的修改，来体现人物的命运发展，来体现文学的价值。

马凡的任何一篇优秀的小说，它应该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人以思想的反思，给予某种生存悖论以巨大的明确性、说服力。^[1]

第一节 审美视角的转移

从叙事审美效果来看，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的转换至少给小说带来三个方

^[1] 凡一平. 广西作家凡一平谈小说创作[J]. 小说阅读网. <http://www.readnovel.com>

面的影响。其一，缩短了故事内容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同一件事第一人称亲历者叙述和第三人称转述，审美效果大不一样。在第三人称转述中，因为叙述者站在与故事无关的立场进行叙述，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显而易见，所以，读者和作品中的故事内容也是有距离的。但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因为叙述者不再站在故事外，而是亲自参与故事内容或者与所讲述的事件有直接关系，因此，故事的可信度和亲切感大大增强，容易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其二，在描写平淡无奇的事件时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效果。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中，叙述者的目光通常比较主观，尤其是当叙述者“我”以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叙事时，因其对事实真相或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前景无法预知，所以容易产生悬念，给人造成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其三，成功地造成三个结构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

文学艺术家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怎样选取素材进行构思，该在哪里着眼，何处落笔等，都有一个角度问题，犹如一个摄影师在拍摄景物时不能不选择角度一样。而不同的叙事角度（或称叙事视点），会使读者对故事里的种种事情有不同的情感态度，不同的评价。角度不同，评价不同，这个故事带的感情色彩就不同，故事的气氛就不同，给读者的心理效果也就不同。艺术创作要考虑对读者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所以要考虑叙事角度的问题。叙事角度的问题，是叙事方法中的一个问题，也是艺术构思中的问题，同提炼情节、刻画人物、表现主题都有关系。一部作品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描写与反映，但却只有一个最佳角度，能确切地恰到好处地表现作品的主题。所以，优秀的有才能的文学艺术家总是千方百计寻找这个最佳的艺术角度，使作品获得最好的艺术效果。^[1]

像《矮脚虎叔》的主人公本来是个其貌不扬、在街口摆食摊的小贩，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人瞧得起。而当传言他买彩票中了彩时，与他毫不相干的荣誉头衔和捐费名目就接踵而来。其实那些狗苟蝇营的登门送聘任书者，道貌岸然却心灵卑鄙。把各种人的形态都表现出来了，可谓再恰当不过的角度了。正是这个巧妙的角度，使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个性特征得到了淋漓尽

^[1] 耿宝强. 选择最佳叙事角度[J]. 语文报·教师版, 第104期 2008. 12.

致的集中而深刻的展现。

这么个叙事角度，有助于刻画阿清的性格，同时也加重了这个故事的气氛。

一般情况下，一部作品采用一个叙事角度，但为了表达的需要，有的作品的几个部分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而马凡先生的很多作品就体现了这样的叙事角度，不但有助于刻画这几个叙事者的独特性格和精神状态，而且使人感受到一种浓厚的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气氛。还有的则是整部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叙事角度，有时又从书中某一个人物的角度展开，每个人物想的、干的，作者都知道；但是有时候，作者又采用书中某一个人物的视点来写。可见，艺术创作中的角度选择是多么重要。有了合适的角度，才能把零乱的生活素材往这一点上汇集，才能沿着它循序成章，一气呵成，构筑起艺术的大厦。马凡说：“我以为，选取角度是能够标志作家眼光敏锐程度的，因此它不仅仅是个艺术形式问题，因为它包含着立意构思的创新”。

选择叙事角度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实质上，它首先是生活的问题，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才能为选择最佳的艺术角度提供条件。其次，要获得最佳的叙事角度，还要有一双善于观察、发现事物内蕴的眼睛，只有透过事物表面，发掘蕴藏在深处的奥秘，才能找到最佳的角度。第三，必须对生活有新感受、新理解、新认识，这样，新的艺术角度才能随之产生。最后，只有从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与主题出发，量体裁衣，才能确定最佳的叙事角度。^[1]马凡的小说创作就善于从生活出发选择叙述角度，还是拿《矮脚虎叔》举例。小说就写了一个其貌不扬、在街口摆食摊的小贩，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没有人瞧得起。而当传言他买彩票中了彩时，与他毫不相干的荣誉头衔和捐费名目就接踵而来。其实那些狗苟蝇营的登门送聘任书者，道貌岸然却心灵卑鄙。马凡因为深切地感悟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而描绘了一系列主要生活在底层的人物的精神世界。

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曰外视角，即由作家以叙事人的身份作叙述。二曰内视角，作者让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或某几个人物充当

^[1] 耿宝强. 选择最佳叙事角度[J]. 语文报·教师版, 第104期 2008.12.

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小说叙述视角的运用，日益丰富、复杂、多样化，它往往是复式的，双向的，多层次的，而且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的状态。它跟作家对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有密切关系，它所投射的视线网络通向每一个主要人物的心灵，跟随人物活动所展示的各种关系和场景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外视角是作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进行艺术构思，塑造人物，设计情节的出发点。有不少场面和情境，作家之所以采用外视角和叙述方式来写，决非事出无因。外视角比起内视角来，也有它自身的有利条件，视野比内视角开阔。作家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可以纵观全局，把小说中的各个部分。各种环节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尤其是生活容量较大、线索较多、头绪纷繁的中长篇小说，外视角的叙述常常起着穿针引线、结构全篇的作用。作为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外视角和内视角的运用，决非孤立绝缘，相互排斥；恰恰相反，两者倒是经常互相渗透，复合交叠在一起的。外视角不时作为人物内视角跳跃、转换、交迭过程中的中介，起着调节作用。愈是内视角变化多端，就愈需要外视角去光照，去统帅，由此来显示作家刻画人物和驾驭题材的艺术才能。视角选择的准备性往往取决于作家艺术构思的深刻性。视角的选择和转换，与作家艺术构思的密切关系，另一个特点还表现在，这种艺术设计往往寓有深意，可以起到深化主题的重要作用。^[1]例如马凡的《阴沟》所写的阴沟堵塞，邻里们相互埋怨和推脱，谁也不动手清理。直到阴沟溢水，那个张先生还坐而论道，最后以他掉进阴沟的结局，通过对邻居的描写，对其自命清高的小市民心理污秽给予了绝妙的讽刺。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小说创作的中心课题是写人，也即是塑造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各种典型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遇、行动、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一幅幅错综复杂的人生图画，从而反映我们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风貌，给人以灵魂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要把人写“活”，一方面，作家得了解人，熟悉人，尊重人，按照每个人自身的性格逻辑，写出他们在特定情境和势态下的各种活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语言、行动。另一方面，作家对自己笔下的每个人物，不能没有一定的审美评价。所谓现实主义精神，最

^[1] 张德林. 现代小说美学[M].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108-112 页.

根本的一条，就是直面人生，敢于大胆揭露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不掩盖，不粉饰。当然，这种揭露是在正确的审美评价下的揭露，不能偏离方向。我们认为马凡对社会阴暗面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他的艺术描绘颇有个性特色。^[1]

第二节 叙述语调的变换

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同时又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叙述语调的形成也会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每个作家都有不同于他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这些都影响、制约着他们独特的生活体验方式、独特的审美体验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也必将影响到他的叙述语调。另一方面，作家所面对的不同生活内容和不同的题材、素材也会对叙述语调的形成产生影响。具有个性心理特征的作家受到某种生活内容的刺激，之后就会形成一种情绪活动一种创作冲动，这种情绪活动必然引起创作主体的一种情感评价，由此产生作家的一种心理情调（态度）。这种心理情调就是形成叙述语调的心理基础。

在审美心理模型向语言形式模型的转换中，这种心理情调就会自动为叙述语言“着色”、“谱曲”，使之带上感情色彩，把作家的心理律动外化为叙述语言中的节奏、旋律和音响。莫泊桑对此深有体会，他说：“艺术家独特的气质，会使他所描绘的事物带有符合于他的思想的本质的特殊色彩。”乔伊斯说得就更明确了：“……艺术家的人格也就慢慢渗透到那叙述本身中去，它像一片澎湃的海洋绕着那里的人物和行动不停地流动。”

如马凡的《蝶花恋·自序》，就很简练而周详地介绍了他在五十年代开始学习写作时的心态和动机。他正是出于这种“感情的冲激”，于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势下，发而为文，以“一般澎湃的热血”，演绎悲情，暴露黑暗，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寄予对普通百姓悲惨际遇的怜惜与同情，并也以此显露出他的创作才华。

^[1] 张德林. 现代小说美学[M].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243, 224 页.

泰国的华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小说的影响，作家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调，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关注社会与人生，对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的悲苦遭遇寄予深切的怜悯与同情，对恶浊的落后势力给以痛切的挞伐。在马凡的文学起步时期，就受到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使得他的小说创作充满着忧患意识和平民观念，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平民百姓的艰难处境，善于从纷纭复杂的平民生活中选择那些令人悲切的生活断片，揭示出那些芸芸众生的生活苦痛与无奈。《补鞋匠的死》里的李老爹依靠在街头补鞋为生，生意越来越清淡，儿女小，妻子病，加之租赁的房屋破旧，不经风雨，使他苦恼不堪。但是房主为了拆迁重建，要他搬迁，而他又无处可去，就施以诡计，把他告上法庭。李老爹被逼无奈，气绝身亡。李老爹的人生悲剧反映贫富阶层的矛盾，富有者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无视贫民的疾苦，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民，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即使是含冤而死，也没有人给伸张正义。这就从深层次上揭示出贫民的悲惨遭际的渊藪，在于社会的分配不公，法律的倾斜，从而使这篇小说被赋予深刻的社会内涵。

语言与音乐不同。在音乐中，作曲家心理的每一微妙的波动都可以在乐曲中得到对应的反应与表现。而小说家在叙述中常常感到一种语言的痛苦，小说家不能像音乐家那样使用抽象的符号来直接表达自己的心理律动，而只能借助非常具体的语句语言间接地来进行表达。“常暗语言浅，不如人意深。”作家常常感受到这种悲哀。但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甘于处于这种痛苦的状况，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正是这种努力。

马凡曾谈到他在这方面的写作体会：“当我构思一篇小说时，除了不断揣摩人物和情节外，还有意识地构思一种味道，也就是大家常讲的‘感情色调’。即便是一篇小说的总体构思比较详细地出来了，我也不愿写；我在等情调。情调没构思好，总感到写出的字也没有色彩。”马凡这里所讲的情调就是小说的叙述语调。他等情调的过程，就是寻找一种适当的语调来准确表达他的情绪态度的过程。

因此，一部作品是否形成了一种整体的统一的和谐的叙述语调，常常是衡量这部作品艺术质量高下与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在小说形成之前，情节、人物、形象、场景等因素在作家头脑中是散乱地堆积着的，或者说，是以空间的画面形式呈现着的。如何使这一切形成有序和和谐的叙述，或变空间画面为一“线性”的艺术？除了选择素材、结构故事等等之外，还要有一种独特的文体来转化这一切。犹如只有藉着一条河床才能形成一条河，故事、情节、形象、人物等也只有藉着一种特定的叙述语调才能被组装成一部小说。因此我认为叙述语调在作品形成过程中还体现了一种协调组织的功能。它犹如一个盒子，它既可装进一些素材，又可把一些素材挡在外面。

因为叙述语调是一个整体，从文本中的每一句话都可感到它的存在。因此，第一句话往往起到一种定调的作用。有了第一句话，同时意味着作者对他所表现的生活有了整体的把握，有了自己明确的态度。这时犹如水到渠成，艺术家的人格、情感态度与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就会和谐统一在一起，“变成流动的闪烁着光辉的叙述”。^[1]

第三节 人物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的这句话，是对人类语言基本特征的一个经典性概括，深刻而全面，历来为人们所引用。它的意思就是说，思想和语言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离不开思想，思想不通过语言就无法表现，语言脱离思想也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凡是思想能达到的境界，语言都能直接充分地把它表现出来。

上述是从一般意义上阐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作为小说创作中的文学语言来说，它固然要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除此之外，它还得遵循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文学语言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主要的，它还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品格和素质：鲜明的形象性，丰富的情感性，表情达意的准确性和透彻性。文学语言的这些品格和素质是为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造型艺术。

^[1] 刘亚伟. 浅论小说的叙述语调——论文纲要[J]. 2007. 2.

塑造人物形象，仅仅“正确”是很不够的，还需要个性化，活蹦鲜跳，有血有肉；作家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沿着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顺势推断。钻到人物的心里去，了解他，认识他，摸透他的思想感情和表达内心愿望的个人思维方式，不是作家代替人物说话，而是让人物说自己的话。在马凡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与读者在心灵上共鸣，艺术感染力达到如此的程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不用如此强烈的节奏和语言，就无法显示人物在特定情势中的特定感情。凌鼎年认为作家马凡的幽默，不是那种唱滑稽戏的硬噱头，我甚至觉得他的这种幽默是从骨头里生出来的，一种自然的幽默感流溢于字里行间，很有点像上海说唱中的“冷面滑稽”，他自己一脸严肃，讲述的也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故事，却又在不经意中忍俊不禁。这实在是大幽默，其中哲理堪可玩味。马凡的调侃幽默有三：（一）轻松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幽默。（二）沉重的幽默，对在社会最底层讨生活的虎叔来说，这玩笑开的大了些，开的残酷了些，简直是带泪的玩笑，同样是幽默，这则幽默深沉得使读者压抑，最多是苦笑一声。（三）讽喻性的幽默，这种幽默在调侃、讽刺的笔调中产生，在此幽默的背后，有表露作者劝世、喻世、警世的意向。由于马凡有摄影嗜好的缘故，他有一双有别于人的洞察社会的眼睛，他对社会负面有特别的敏锐的感触，他善于发现生活中正面与负面的种种印象，用善于发现的眼睛去捕捉这种镜头。摄影是最客观、真实的，可能受此影响，马凡用笔为社会留档，解剖社会时一点不遮遮盖盖，让生活的真实完全裸露在读者面前，有些描写真实得令人心颤。因有忧患意识，也就派生出了他的批判意识。^[1]特定的人物语言，配合特定的情景势态，体现特定的社会气氛和人物情绪，这就形成了小说中的语境。要谈语境的艺术感染作用，就体现在这里。

马凡的小说很注重语言的优美，并以此来渲染环境，抒发情感。如在《高山日月》的开头，作家对山寨的夜晚是这样描绘的：

“入夜，山寨一片宁静寂寥，只有蛙声虫鸣，此起彼伏。它们像齐心合力演奏着一首小夜曲，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睡在帐篷里，听在心坎里，享受一片清宁的心境。银色的月光，撒洒下一片白茫茫的光辉，使整个山寨沐浴在

^[1] 司马攻.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 马凡文集——泰国卷[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8, 351-353页.

柔情似水的爱抚中；像娇羞的姑娘头在爱人的怀抱里，在夜色中，看去若隐若现。”^[1]

这段景物描写渲染了山寨的优美环境，制造了氤氲的氛围，为小说主人公进入深山摄影采风进行了思想的铺垫，同时也以这种优美宁静的环境为以后所描写的剿毒斗争埋下伏笔，更加反衬出剿毒斗争的激烈、艰苦和复杂。

《高山明月》前一段作者伏笔描写高山地，看来是一片和平、安祥的境遇；其实却不然，它的背后蕴藏着即发的战火……

“在黎明前刻，天地还是一片昏黑。高英的士兵像荒野的鬼魅般蠕蠕而动，趴下山去，埋伏在营寨前不远的隐蔽处，等待太阳在东面山头升起时，一声令下就可开火了。部队的战士似乎带有作战之前的冲动与紧张；大伙儿握着枪，眼睛紧紧地注视着营寨中的活动。看着李老夫营寨前两三个放哨站岗的士兵，不断地抬头仰天打呵欠。有的着抽出烟支点燃了火抽起来，吐出一口口烟雾。山地黎明前的雾霭特别浓，营寨笼罩在一层层的雾气中。冯天对这一幅山寨晨雾中迷人的图景，手痒痒地多次想按下快门，但恐怕快门清脆的声响，会惊动营寨前的哨兵，就忍下来握紧相机藏在大石后。他像一个战地记者，准备在战争中，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拍摄。”^[2]

《战地情》中对西贡街头临战环境的描写很有典型性。如，三五成群的兵士“在大马路上人行道的地方，摆叠着沙包阵地，架上机关枪，上了子弹，严阵以待”，铺子店面“在人行道上都布防了铁丝网儿，把整个店子蔽住”，等等，不用过多的笔墨，西贡临战前的恐怖、紧张气氛就被烘托出来，使每个未经其境的读者也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在《狗仔的梦》的结尾，作家以独立的一节描写了这样的景物：“天边残存了几抹淡淡的云彩。天就要黑了。这时，忽有一种熟稔的摇铃声，从远处的街道，慢慢地传来……”这个结尾犹如电影中的空镜头，以形象的画面暗示出狗仔的同伴们在儿童节这天痛快地玩了一天，都回家休息了，可是他为了生存还不得不沿街摇铃卖冰棒。这个十多岁的孩子

^[1] 司马攻.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 马凡文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199页.

^[2] 司马攻. 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 马凡文集——泰国卷[M].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8, 206-207页.

的艰难处境，借助于这种景物的描写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作家的感情流向也自然地渗透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出身、经历、职业、气质、文化教养等等都是不同的，他们各人的个性风貌自然也有区别。作为透露性格的一种标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方式、语言口吻。不同阶层中的人物的语言固然有明显的区别，就是同一阶层中的人物语言也不完全一样。这个真理，二千多年前的亚理斯多德早已说得很清楚：“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个性化、生活化的对话，很能扣动读者的。

俗语说：“言为心声”。人的心灵是一个深邃莫测的内在世界，他对生活中的各件事都会作出反应。对话中透露人物的心境、心态、心绪、心理，常常是复杂微妙、变化万千的，有时甚至连人物本身也未必明确意识到。对话中有明台词，也有潜台词，潜台词隐伏在明台词的背台，可让读者自己去琢磨。^[1]

^[1] 张德林. 现代小说美学[M].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314, 321, 319-322, 326 页.